

# 哈佛大学欧文·白璧德比较文学讲座教授及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 “我是大学这个机构的仆役”

采访 / 刘苑如 Harrison Huang

“历史就像压路机，当它滚动时，先将作品的文字压得越来越平坦，我们的工作就是重新恢复其间所有的差别。不同的用字，声音各异，我试着提醒他们注意其间的差别，其声响、感性、语意都是不同的东西。”宇文所安说。

## 教、研共享的基本信念

宇文所安拥有广大的中、西读者，超越既定的学术圈，早已接受过各式各样媒体的专访，在接到本次企划后，对某些采访议题深表兴味，也坦承有不喜欢的问题，但终究还是耐下性子从最显题的现象谈起。在面对神奇的统计数字这类问题，他叹了一口气说：“一般来说，当我年轻时，比较能全神贯注；随着年龄渐长，越来越像是一种‘怪物’(creature)。”随即莞尔，补充说：“一种机构制造出来的‘怪物’。换句话说，就是大学这个机构的仆役。”他在1972年取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后，即开始在该校任教。提及教学，则又感性起来，他说：“我在等你们的时候，回想自己从一开始就有研究生，那是多么幸运的事。”由于自觉有教导的责任，为了让中国文学被好好地理解，备课时总是一再地重读文本。“很早我即有一个信念”，他说：“尽管是过去处理过的材料，我也一定先读第一手材料，在阅读的同时即试着写，然后重写、再重写，一直到某个定点，才开始阅读二手资料。”在带学生时亦然，必先要求学生阅读主要材料，并试着提出个人看法；在此之前避免先读前人的研究。

至于反覆阅读原始材料的妙处，宇文所安举了他最喜欢的例子。他说，在王维的《辋川集》中，细看其中的标题，许多语汇在唐代诗歌或散文中都未曾有过先例。由此设想：这些标题在当时京城人的眼中作何感想？城外的乡野吗？尽管这些文本不乏许多的诠释，当你带着问题细读文本，将其放置于另一种不同的脉络，从村野性(rusticity)、神性和地方性等视角来观看，思考什么是中国？长安、关中？抑或是城南？他兴奋地表示，从未见过对秦地(陕西)的世界，有如大唐时展开如

此密集的论述，首次彰显此地所具有的厚度与力道，从而揭示这本集子如何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一个佛教徒的世界。这时候再读《鹿柴》，想想“柴”这个字被使用过多少次？从数据库显示，以前没有人在诗歌标题或内文里用过这个字，但那是士大夫的问题。因为凡是有菜园的人都知道，鹿是一种麻烦的动物，它们会吃掉园子里种的所有一切。因此，当有人要种植些什么时，就会做一个鹿柴——也即是篱笆，阻止那该死的鹿。宇文说得众人齐笑，但他随即开始反驳“辋川鹿苑”的说法。他认为鹿柴与本土故事(Jātaka)中的鹿苑(Samath)无关，鹿苑曾经是一个狩猎公园；在这儿既没有人想杀鹿，也没有人是佛；而那些在菜园里工作的人只希望能阻止鹿，不要让它们把蔬菜吃光。站在外面的人才会遇见了鹿，追寻鹿的踪迹。换言之，当你开始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即可发现材料之间都是彼此互相依附的。

宇文马上申明：“这样的诠释并不意味着破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在耶鲁的教学生涯中便启动了思辨性的倾向，尝试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从而发表了一系列颠覆过去学界共有看法的论点，特别在作者的问题上。他指出，作者的观念很晚才出现，大约要到西汉末年才逐渐生成。以其教授的《楚辞》课程为例，他发现大陆学生很难接受将“屈原”的作者地位“悬置”起来。于是他在课堂上，不说没有屈原，而问有什么证据？如何假设？还有哪些可能？他认为这是成为一位学者的过

“你必须一开始就走在一条对的路上，才能越走越远。”

当前最著名的前现代文学(Pre-modern literature)研究学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1946—)，现任哈佛大学James Bryant Conant大学讲座教授，历经四十多年的教职，于2018年暑假荣退。

二月隆冬的午后，在他建造于19世纪中叶的宅邸中，接受专访。谨遵夫人田晓菲教授出门前的交代，沏上一壶好茶，还不忘准备一个特大号的茶杯给来客，一边开始以感性又不失理性的语调，追忆平生的学术历程；揭露如何打造出拥有十一本英文著作，二种英译作品，一种中文选集；平均每四年即有一本专著，至今仍不间断，俱有一种以上的中译本，新近的单篇文章，更是很快就出现译本。因此，他不到五十岁就成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1991—)、哈佛大学欧文·白璧德比较文学讲座教授及东亚系教授(Irving Babbitt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Professor of Chinese, Harvard University, 1994—1997)，也是美国哲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会员，并曾荣获古根汉奖(Guggenheim Fellowship, 1986—1987)、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中国学研究奖(ACLS Fellowship in Chinese Studies, 1994—1995)、梅隆基金会杰出成就奖(Mellon Foundation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唐汉文学奖(2018, 与斯波义信共同获得)等奖项。指导博士亦多达近四十人的辉煌成绩。

程之一。同时一再鼓励学生：“做学术工作时，若能不轻易接受大家都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可得到非常不同的答案。”“屈原是一个古老的中国故事”，他将两个食指交叠，继续说：“你必须一开始就走一条对的路上，才能越走越远。我只是问一些开始和如何开始的问题。”因此，他自认并未采取任何激进的行为，而是重新整理传统，同时也必须承认，过去某些被认为不可或缺的事实，其实大有问题。

他又以即将出版的词作研究书籍为例(Just a Song: Chinese Lyrics from th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 哈佛大学出版社)，在北宋时期，重复收入冯延巳(903—960)、晏殊(991—1055)

和欧阳修(1007—1072)集子的词作，多达20—30%，即使一些大学者也莫衷一是。面对这样的状况，通常有两种解决方式：一种是根据每种状况，逐一判断其归属是否正确；另一种则是思考这些词集的结果过程是否有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又为何会如此？根据他的判断，作者归属有问题的词，数量一定比我们目前所见的更多。人们四处询问作者的相关记载，引用某某手稿，问题是某某的资料来源为何？在一个亟需作者姓名的文学传统中，研究者必须练习接受“无名”的事实。

由此假想，宴会中词作被“挂上”作者的情境：刚唱完一首名词的歌伎，在被追问作者时，她可能说不知道，也可能说是她自己作的——虽然歌

伎是词曲世界里真正的行家，但是文人们却很难相信一个年轻女子可以写得出这样的歌词来(宇文说着自己笑了——他解释说其实他在笑那些文人的偏见)；抑或说是欧阳修、冯延巳，但下一次可能又变了。当然这都是假设，我们无法确证。因此，或有某些著作建议使用“采”这样的用语，意谓着有人挑选了这些作品，却仍不足以证明作者的归属。正因为人们相信这些词作一定有作者，就无法理解根本没有答案的事实。

追究宇文所安的研究信念，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点。他说：“我是一个蛮厉害的重写者。”当他看到喜欢的东西时，一有想法就会马上写下来，可能成为一篇文章的部分，也可能行不通；那就不断重写，一直到这些片段之间成为一气贯通的整体为止。换言之，也就是在研究中学习。他强调，如此也就不那么需要引用，或者毋须找到正确的引用；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处理的议题各不相同。他再次提及他近年对词的研究，处理了不同词集作品重出的现象，这都是过去没人讨论的问题。而将这些发现集合起来，累积相当数量的范例，就是一种“版本研究”的开始(和传统版本学不同)。他说：“当你这样做时，将会发现并没有很多人可以引用。如果有人这样做了，你肯定会非常尊重他们。”

作为一个资深的研究者，从已知到未知的探索过程，必须填补许多文本中留下的空白，无论出于偶然，或出于编辑的偏见。宇文表示，他宁可用“标目”(indices)代替想象，作为弥缝间隙时的线索，原因在于这个词非常开放，让人可以得到一些提示，却不表示可得其全貌。好比他在教《艺文类聚》中的诗歌时，学生常误将部分引诗当作全诗，为师者就必须提醒他们其中亡佚的部分，使其明白诗本身固然可大可小，佚失的是曾经完整的文本。